



九江历史上的旱灾(上)

■ 崔若林

旱灾之诱因

旱灾就是久晴不雨,植物体内水分大量亏缺,导致植物生长发育不良而减产甚至绝收的灾害。这种灾害有土壤干旱与大气干旱两种情况:土壤干旱是土壤水分不能满足植物需要的一种干旱现象。大气干旱是大气中的干旱现象,温度高,相对湿度低,作物蒸腾速率远大于根系对水分的吸收,使作物体内水分平衡破坏,发生枯萎而受害。

高温往往与干旱相伴。九江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春季春雨明显,夏秋间晴热干燥。每年7月中旬以后,长江中下游为副高控制,雨带北移,全市开始酷热少雨,气温逐渐上升,有时还有可能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如1953年8月15日修水县日最高气温达44.9度,这个温度极高值至今仍为九江和全省的高温之冠。而此时此刻正是农作物需水关键时刻,几十天不下雨便造成严重干旱。全市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干旱,一般多为夏(伏)旱和秋旱,春旱较少。有的年份,夏旱连秋旱达100天以上。从每年雨季结束后至10月中旬止,在此期间内若持续20天以上,日降雨量小于10毫米,过程降水量小于20毫米,为受干旱。受干旱的状况,根据干旱天数可分为三种类型:20~30天为轻旱;31~60天为中旱;60天以上为重旱。重旱对于农业生产危害最大,其成灾面积、影响范围,往往超过水灾的损失,同时,也极大地危及民众的生命财产,故九江俗话说:“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就是这个道理。

重旱之灾情

史料记载,九江旱灾年出现最多的是17世纪,100年内有31个;其次是18世纪为20个,19世纪为17个。20世纪减为9个,这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地大力兴修水利,抗旱能力大大提高,使许多易干旱地区面貌发生根本变化,有的地方已是旱无无忧;但江陵地区水利条件差,仍然易受干旱威胁。据九江水文资料统计,九江历史上严重的旱灾择录如下:

唐武后天授二年(691),彭泽县令狄仁杰“越六月至县,值年大旱,民罹饥馑”,他在《奏免民租疏》中申述:“彭泽九乡,百姓齐营水田。臣方到县,已是秋月,百姓囂囂群然告歉。询其所自,皆云春夏以来,并无霖雨,救死不苏,营佃失时,今已不可改种。见在黄老草菜度日,旦暮之间,全无米粒。切见彭泽地狭,山峻无泉,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准例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今总不收,将何活路?自春但夏,多幸亡者……”旱灾给当时当地民众带来的辛苦楚可见一斑。另据《旧唐书》《新唐书》“五行志”“本纪”载:唐永贞元年(805),江州大旱;元和三年(808)亦大旱;长庆三年(823)秋旱,螟蝗害稼八万顷;宝历元

年(825)秋旱;大和八年九月,“九江旱,无稼”。

《明实录》云:明宣德九年(1434)南康等府,属地自4月至8月不雨,田稼尽枯,命行在户部遣人覆视宽恤。正统三年(1438)九江府彭泽等县6月以来不雨无收,秋粮子粒输纳不敷。景泰三年(1452),九江所属今岁多被旱伤;七年(1456)南康、九江等府属县全年自夏及秋不雨,旱伤不稼,秋粮二百三十二万余石(担)无从征办。成化三年(1467),九江府4月至6月不雨,田禾尽枯。嘉靖二十三年(1544),九江、南康府夏秋不雨,农者无获;都昌、星子、建昌(今永修)等县5月至8月大旱,民众死半,府县行賑,匍匐就食者枕藉沟中死者无数;武宁、义宁(今修水)大旱,民食树皮,死者甚众;湖口大旱,米价昂贵。万历十七年(1589),南康、九江府3月至8月,有五月不雨,早晚稻俱伤,秋稼绝粒;都昌大旱,米价飞涨,民采野蕨充饥,有挖草根以苟延者。湖口大旱大饥,死者半,瑞昌民死者十之一、二。崇祯九年(1636)和十三年(1640),彭泽大旱,民掘石粉食之,粉出陶王山、马王山等处,久食,四肢乏力,且便闭;崇祯十四年该县4月至6月又大旱,秋蝗食粟尽,饥殍载道。

清康熙十年(1671),九江、南康府大旱。九江府5月至12月不雨,泉洞皆枯,禾稻尽稿;民以葛蕨、草根为食,卖子女者无数,流亡者十之七;南康府5月至11月不雨,米价涌贵,民多饥死。咸丰六年(1856),九江、南康府夏秋大旱。德化县自夏至冬200日不雨,瑞昌无禾获。武宁自3月至8月不雨,有田亩者绝收。同治《武宁县志》中的《悯旱行》作了这样的描述:“君不见,去年赤旱百余日,万落千村半空室。今年盛夏魃尤虐,八月炎风雨尚搁;修江流断井泉竭,夜夜轳轳音不歇。沙边乾雀干欲死,岩颠枯树秃如指;田成十字尽龟文,四望红炉野火焚。东郊老翁年九十,说此穷愁生为习。西家寡妇仰天哭,孤儿牵去换谷……”同治三年(1864)彭泽大旱,斗米钱七百,城乡群豺食人,尤嗜小儿。光绪二十四年(1898),彭泽5月至冬月,未雨,大片农作物颗粒无收,人畜饮水皆缺。

民国十四年(1925)江西全省41县旱情严重。彭泽县高处田禾已枯,低处亦多枯萎;武宁、修水早稻、中稻均成枯槁;永修、德安大旱3个月,各乡田禾乏水,亦近枯槁。二十三年(1934)自六月十六日后,百日少雨。7月份九江降雨仅5.2毫米,为70年所未有。早稻收获仅一、二成,晚稻大多颗粒无收。瑞昌田土龟裂,禾稼枯凋,全县稻、薯收获量不及一成,灾民多以湖草、蕨根和观音土为食,饿毙者到处可见,仅肇陈双港村就饿死73人。德化县全县受灾农作物15.64万亩,受灾人口23.45万人,灾民多以糠粃、野菜充饥,或者外出乞食,饿毙者随处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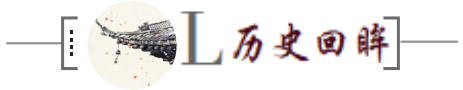
1949年至1990年的41年间,九江地区大抵每隔3~4年就发生一次旱灾,特别是1959年至1961年三年连续大旱,成灾耕地面积均在100万亩以上,赤地千里,禾枯土裂。据

聂云从《九江百年赈灾》记载:“由于3年旱灾,使群众备受苦难,大伤元气,口粮极为缺乏,灾民中浮肿、子宫脱垂、闭经等‘三病’严重发生,尤以九江县居多,修水、瑞昌县次之,据当时统计‘三病’对象除已治愈者外,有23459人。其中浮肿4794人,子宫脱垂10180人,闭经8435人。九江县当时抽调284名医务人员,组成34个医疗组,分赴各社队巡回医疗,并在十分困难条件下,拿出粮食1000余斤,黄豆690斤及部分鱼、肉、食糖、红枣等,发给严重病人以资营养。当年,省政府曾拨款救灾款73.1万元,另拨‘三病’查治经费20万元。”

1978年从6月下旬开始,直到11月初,时间长达5个月之久,伏旱、秋旱罕接冬旱,又至第二年春旱,这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据水文部门资料统计,全市7、8、9三个月降雨仅100~150毫米,比上年同期少50%~70%,而在此期间,高温天气,为历年所少见。进入7月以后,气温节节上升,全市相继出现了38度以上的高温,武宁、瑞昌等地7月上旬最高温度曾达到40度。据记载,全市7、8月份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的有23天,平均日蒸发量最高达18.2毫米。前期降雨偏少,水库蓄水普遍不足,只有计划蓄水量的50%左右。各江河水位普遍比往年偏低,出现梅雨时节无雨,汛期无汛的少有现象。到6月中旬雨季就基本结束,比往年提前一个多月。7月15日,受台风影响,部分县、区虽降雨1次,旱情有所缓和。但进入8月以后,全市继续无雨,旱情迅速回升,二晚栽插面积因缺水只完成计划80%。大部分小塘、小水库、小溪、山泉已经干涸或断流,大中型水库剩水量甚少。据8月中旬统计,全市877座小(二)型水库,干涸340座,160座小(一)型水库,干涸40座。武宁县155座蓄水工程,除3座尚有少量水外,其余全部干涸。各江河水位也都接近历年的最低值,流量大大减少,给抗旱增加困难。全市人畜饮水困难的生产队有330个,武宁县的一些村庄要到十几里路以外的湖北省境内挑水,许多乡、村食水按人口分配。这年旱灾损失严重,据9月22日统计,全市受旱面积已发展到251万亩,其中棉花35万亩。更严重的是,这场大旱不仅给1978年的晚秋作物和冬种作物造成严重损失,还直接影响到第二年的春灌,使得1979年出现了历史少少有春旱。

1985年从4月至6月,全市降雨量比多年平均数少300毫米,水库蓄水也相应减少,进入盛夏高温季节,降雨更少。出现严重的伏、秋干旱。据9月上旬统计,全市受旱面积中,有31.28万亩开裂发白,有20.28万亩断水,6.98万亩基本无收。受旱的棉花有11.95万亩落叶枯萎。20座中型水库蓄水仅10070万方,不及1984年同期的一半。湖口县舜德乡784口水塘,干涸了679口;九江县岷山乡64个村庄,有27个到外村挑水饮用。

(未完待续)



9月往事之一——

击毙饭冢国五郎

■ 冯晓晖 陈再阳

概述:

1938年9月3日,饭冢国五郎在庐山脚下被击毙。

饭冢国五郎(1887年~1938年)日本陆军军人,最终军衔为少将,生于日本群马县,曾参与西伯利亚干涉。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担任第101师团101联队队长,参与武汉会战。1938年9月在进攻庐山时,被国民革命军在九江星子县击毙。

评述:

饭冢国五郎是武汉会战南浔战役期间战死于九江的军衔最高的日军将佐,联队队长是大佐,等同于国民革命军上校。他死后被迫晋为日本陆军少将。

饭冢国五郎被击毙的过程,近年来有个版本流传甚广,特别精彩生动,常见的标题是:一个因为摆POSE被打死的日军少将。笔者选了其中一则,简录如下:

饭冢国五郎,日本陆军少将,101师团101联队联队长。有一段时间,日本东京各大电影院连续放映“军神饭冢联队长”的战地摄影。

1938年9月3日,武汉会战前期,日本著名战地记者小俣行男一行到庐山前线采访饭冢。庐山一线中国军队奋勇抵抗,中日双方在东孤岭浴血苦战,饭冢连续发动了15次进攻,依然无法击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损兵折将。

因为苦战,饭冢晒得极黑,胡子已经多日不刮,显得相貌狰狞。尤其是天气酷热,他上身赤裸,显得颇为凶猛。于是,小俣就建议饭冢给他们摆几个姿势,以展示将领们在中国有多么的威风。饭冢推辞不过,便来到一个比较符合战场气氛的高地,拔出指挥刀又吼又叫,又蹦又跳。日本记者为了表现效果,还给饭冢扣上了一顶钢盔。当时日军钢盔的涂漆有些问题,漆面剥落,露出了钢底,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然而,这个高地正好处在中国阵地的对面。中方哨兵发现远处有一个灯泡似的东西在那里又蹦又跳,定睛细看,是个鬼子!看见却又没办法,距离太远,汉阳造步枪够不着。大家正在恼火的时候,有几个老兵晃晃荡荡沿着战壕走过来了,他们背的是日本造的是三八大盖儿,这种枪射程远,射击精度也高,饭冢所在的那个高地,汉阳造打不着,三八枪正好合适。

于是哨兵向老兵们说明了情况。老兵枪法好,把枪一摘就瞄上了。只听“砰”的一声,饭冢应声而倒。子弹从后心钻进去,穿过了他的心脏,所谓的“帝国军神”,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就见阎王去了。

这类文章一般会配上各种表情包和《亮剑》剧照,读起来跌宕起伏,结局令人拍手称快。笔者当年第一次读的时候,也觉得甚是快意,再想到发生在庐山,快意加倍。

然而,这是一篇故事,不是史料。史料中不允许出现某某“觉得”“想到”一类的词汇,也不应该有情绪化的描写。故事一定会背离史料,有的相对靠谱,有的却会瞎编。

笔者查询,这些文章都改自某位著名旅日作家作品——《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作者长期

在日本工作,自称收集了很多侵华日军的回忆录,因此用第一手的史料“还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抗战史料,该书出版后引起轰动,曾获“香港亚洲周刊2007年度华文圈非小说类十大好书奖”。

饭冢国五郎被击毙的一段,出现在《甲首三千——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一章中,文章细节很多,但漏洞更多,作者其实是在伪造历史,他声称故事源自国军官兵的回忆,没有给出证据,也没有日本方面的材料。

笔者未能找到作者声称的抗战回忆文章。没必要查证,因为这段故事是按照影视剧本来写的:先交代环境人物,有记者采访,有现场表演等等。然后,镜头一转,摄像机到了中国阵地上,有情绪,有动作,最后完成800米外的精彩狙击。然而中国军人怎么会知道打死了对方的军官,怎么会知道那边在摆拍?俯瞰众生的上帝知道,这叫“上帝视角”,是在拍电影。其实被击毙前饭冢只是大佐,他的级别轮不到当“军神”,他是战死后才被吹捧起来的。

真实的历史没那么精彩。据第九战区第一兵团作战科长赵子立回忆:“东西孤岭,在庐山东南麓,居高临下,瞰制着德星公路,是日军必攻、我军必守的要地。日军连续进攻十余天,九月三日,占领东孤岭。我军七日退守西孤岭。日军又一连猛攻四天,十二日又占领西孤岭。守德星公路的我第二十五军、第六十六军等部,他们浴血奋战,将日军第一〇一联队长饭冢大佐击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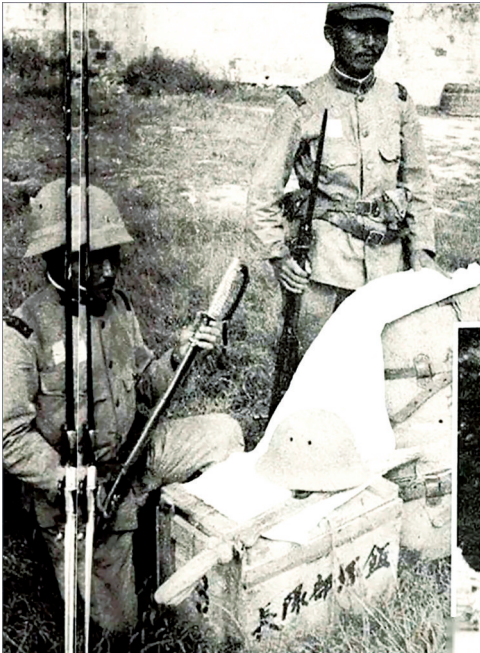
饭冢是如何战死的?日方的史料记载得很清楚。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昭和十三年(1938)九月三日中午一时二十五分,饭冢国五郎大佐在星子西南的战斗中中弹身亡。

日军的战报对这场战斗有详细的记录,包括战斗过程、各级军士姓名等。战报写明:右翼队长饭冢大佐在秀峰寺西南香炉峰峻线,被枪弹贯穿胸腹部,重伤不治而亡。棱线即山脊线,饭冢被打死的地点,就是现在秀峰景区缆车行走的那条山脊。

因此,对照我方将领回忆,可以很容易还原当时的情形。饭冢率领部队连续攻击东孤岭十余天,在9月3日终于拿下了东孤岭。由于战损极大,他亲自率队发动冲锋时被击毙。攻击秀峰时日军是仰攻,山坡陡峭,守军视野很好,挥舞着指挥刀的军官当然会被国军枪手优先照顾。

从这段史实更可以说明,那段故事是瞎编的。到了最后的攻击日,双方都杀红了眼,居然会有一位高级军官,无聊到光膀子戴着钢盔,挥舞着军刀在阵地上摆POSE?日军的军纪也不会那么涣散,记者在现场也拍摄了进攻前的照片,日方为了打造“军神”在饭冢死后发布的照片,图中那位站在正中,头戴钢盔手拄指挥刀的就是饭冢,或许这是他生前留下来的最后一张照片。请问这位穿戴整齐厚实的军官,像是个光膀子舞刀的狂汉吗?那个掉了漆闪闪亮亮的钢盔就是这一顶吗?

南浔战役庐山两翼的战斗异常惨烈。庐山北麓的金官桥,德星公路的东西孤岭,从7月底一直打到9月中旬。近两个月中,中国军队一改之前一触即溃的情形,以超强



饭冢的骨灰盒和遗物。



饭冢(白圈所示)战死前的照片。

的战斗意志,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也让日寇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不仅是联队长饭冢被击毙,他手下两个中佐也战死于东孤岭。9月28日,101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伊东政喜,在隘口街附近指挥战斗时,遭到中国军队山炮击伤,险些丧命。同日,该师团103联队长长谷川幸造大佐(与饭冢平级)被击毙。

101师团在南浔战役中损失近3000人,101联队和103联队在后面的战役中全军覆灭。中方的损失多大呢?笔者告诉您一个不忍直视的数据:中日战损比为7:1。这就是真实的战争,没有轻松游玩的老兵,没有张牙舞爪摆POSE,没有抗日神故事,有的只是铁和血,一寸山河一寸血。

饭冢国五郎死后,遗体在秀峰寺火化,骨灰和遗物被送回日本。日军先在秀峰寺前临时用木头做了个长方形墓碑,后来在一块较大的岩石上刻字,制作了永久墓碑,立在秀峰的龙潭旁。

这块墓碑石后来坍塌在地上,因风化字迹渐渐漫灭,也无人注意。2011年,秀峰景区的承包者发现这块石头。笔者觉得,这位日酋的墓碑有必要向公众展示,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只要做好说明。它可以讲述那场发生在1938年夏天的惨烈的南浔战役,它更可以用来告诉世人: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这场铁和血的历史,而不是让那些神故事、神剧传播虚假的历史。



精彩的汉阳峰石刻对联

■ 贺伟



汉阳峰为庐山最高峰,海拔1474米。

汉阳峰顶的石刻不多,只有三处。一处是峰顶南侧的岩石上刻着两个楷书大字“庐顶”,表明此处为庐山最高点,这是1934年由一个叫“陈兴壶”的所题。另一处是峰顶汉阳台石亭的门额上刻有“汉王台”三个隶书大字,这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929年所题。史书上记载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巡行南方时曾登上庐山,汉阳峰上筑有汉武帝休息的“汉王台”。峰上现有的汉王台是林森重建的,林森尽管没有什么实权,怎么说也是名义上的“皇帝”,他在此重建“汉王台”,还是曲折地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幽愤的。

这两处石刻并无特别出色之处,引人注目的是峰顶正中立的一块花岗岩长方形石柱,高133厘米,宽33厘米,厚28厘米。石柱四面都刻有字,是庐山唯一的一块四面题字的石碑碑。石柱的正面、反面为正楷书写的“庐山第一高峰”、“大汉阳峰”,两侧则为行草书写的一副极精彩的对联:

峰从何处飞来,历历汉阳正是断魂迷楚雨;
我欲乘风归去,茫茫禹迹可能留命待桑田。

这副精彩对联及石柱正、反面题词都是由清朝南康知府王以敏所题。

王以敏生于1855年,卒于1921年,湖南武陵人。他18岁中举人,35岁中进士,随即在北京入翰林院任编修。王以敏才华过人,又较为廉洁耿直,居京9年,实在看不惯清末官场的腐败,便以不习惯“燕地苦寒”为理由,要求外放南方,后在湖南、江西一带为官。光绪末年,王以敏任南康知府。他极喜欢庐山,一有闲暇,即登山游览,探幽览胜,吟诗作赋,为庐山所作的诗就有数百首。王以敏还为庐山写了不少对联,汉阳峰对联是其中极精彩的一副。

对联是人们所熟悉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历史也很长,可上溯至五代时期。但很多年来,对联似乎被看作是雕虫小技、笔墨游戏,很难入正宗。比如郑板桥、徐文长都是题联名家,但《郑板桥集》《徐文长集》却未收一副对联。尽管如此,对联并未被废弃,反而受到大众的欢迎,很多名联广为流传。就拿王以敏来说,他为庐山写了几百首诗,但真正影响大的,能使他流芳庐山史册的,倒是他作为庐山汉阳峰写的这副对联以及他为玉帘泉写的另一副对联:“荡胸生层云,炯如一段清流出万壑;濯足弄沧海,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王以敏为汉阳峰写的对联道尽了汉阳峰的壮观和内秀。

“峰从何处飞来”,一语写出汉阳峰的高拔、峻耸,奇立于群峰之上,卓尔不群,不像是与群峰一同生成,而是从天外飞来一般。毛泽东《登庐山》诗中的“一山飞峙大江边”似乎有王以敏此句的影子。伫立在汉阳峰顶,低头俯瞰,云雾飘渺中悬浮着无数峰峦峻岭;放眼远望,烟雨迷蒙处,正是吴天楚地、汉阳重镇。面对寥廓的江天,面对亘古不变的河山,很容易令人产生一种沧桑之感,感叹人是多么渺小,人生是多么短暂!何必还去为那些虚名浮利而勾心斗角,何必还去为那些红尘烦事而烦忧焦虑!“断魂迷楚雨”有几分苍凉,更有无尽的感慨!此句既写出了汉阳峰的高峻,卓尔不群,又包含多少历尽沧桑的人生的感叹。

“茫茫禹迹”,则点出汉阳峰不仅是一座雄伟高山,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传说中华民族敬仰的人物大禹治水时,曾站在此处,察看茫茫水势,苦思治水的良策。汉阳峰南侧的一处石窟叫“禹王崖”,就是为纪念大禹登临此峰而得名的。大禹的登临,使汉阳峰在奇峻的自然风貌之外,又增添了极具魅力的文化内涵。但大禹登临庐山观察水势只是传说,也有后人质疑。治史极为严谨的司马迁却相信,他不辞辛劳,披荆斩棘,亲自登上人迹罕至的大汉阳峰考察,做实此事。他在《史记·河渠书》中郑重写道:“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这是“庐山”的名称伴随着大禹、司马迁这两位伟人第一次正式登上中国历史史册,庐山的第一次亮相,就是这样卓尔不凡,这真是庐山的幸运。

后人慕名登临汉阳峰,除了一览众山小的逸兴,更怀有千古思高贤的敬慕。来的人不管盘桓多久,终要“乘风而去”,惟有汉阳峰伴随着“茫茫禹迹”,目睹着沧海如何化为桑田!此句中含有多少对前辈高贤的追思敬慕之情,这种追思敬慕之情化为绵绵不绝的中华精神,一代代地久传不衰!

王以敏此联一出,即广为传诵,几乎成了汉阳峰的广告词。登临汉阳峰的人,都要先在此联前驻足,细细地品味,然后再移步峰巅前端,俯瞰远眺,感受此联的蕴意。